

【计划生育理论研究】

论影响生育观的微观因素与宏观因素

——兼论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的作用

何彦

近年来,人口学界发表了不少分析影响生育观的因素、探讨中国农民生育意愿的文章。这类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在研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自然环境诸因素对生育观的影响时,往往从微观角度展开。主要提及了下列因素:家庭经济职能及儿童经济价值、劳动力培育费用、育龄妇女所从事的职业、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社会保障程度、家庭及个人消费需求、育龄人口特别是育龄妇女的教育程度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变化直接影响个人及家庭的利益,并影响人们的生育观和生育行为。微观角度的研究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我认为这是80年代初以来中国人口学研究深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从这种研究中所提出的从微观角度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并以此影响人们的生育观,使之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相一致的政策性建议是非常可取的。在赞同这种研究所提出的许多观点及政策性建议的前提下,我认为仅从微观角度研究生育观,存在某种片面性。即从这种研究中看不到宏观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自然环境等因素,包括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就业、经济发展、国民教育对生育观进而对生育行为的影响。那么是不是这些宏观因素不对人们的生育观和生育行为发生作用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我们不妨设想,一对从事人口学研究的育龄夫妇婚后在作生育决策时是怎么想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在作生育决策时决不仅仅

考虑那些与他们的利益与需求直接相关的因素,还会考虑人口对生态、耕地、矿藏、就业、国民经济发展、国民教育等所造成的巨大压力。他们的人均意识、人口忧患意识肯定会对其生育决策起作用。仅仅考虑微观变量而不考虑宏观变量,人均意识、人口忧患意识是决不可能形成的。因此,可以说对人们的生育观进而对人们生育行为有影响的因素,除了那些直接对个人和家庭利益有影响的微观因素外,还包括那些对人口整体或国家、民族利益发生作用的宏观因素。

理论工作者将中国70年代初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效果归纳为五个方面:(1)少增加2亿人口;(2)人口再生产开始从“高低高”类型向“低低低”类型转变;(3)温饱型消费;(4)工作人口负担减轻;(5)宏观比例开始协调^①。我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得到了大多数群众的理解与支持,而绝不是仅靠行政强制推行所能取得的。换言之,家庭在作婚育决策时,不仅考虑自身利益而且也考虑并服从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人口忧患意识也对他们的理智起作用,只是他们对那些宏观问题没有人口学家认识那么深刻、全面,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也不能排除相当部分群众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是被动的。

^① 侯文若《中国人口政策评估》,载《人口研究》1988年第6期。

但把70年代初以来实行计划生育的成果全归于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是不可想象的。

假如说“相当多的群众已逐步理解并自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这个判断是比较客观的，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宏观因素对群众的生育意愿起作用。这是因为，中国制定以控制人口数量为中心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以中国的国情即人口多、底子薄，人口对资源、生产和环境的压力很大作为客观依据的。群众理解并自觉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表明群众在观念上肯定了作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客观依据。

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在农村，农民生育意愿是研究的重点。单纯采用微观分析方法研究农民生育意愿，只能到看农民是如何算自己的一本帐，看不到农民算整个国家的帐。但是，假如我们在研究农民生育意愿时采取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结论就会有变化：农民算自己的一本帐体现农民生育意愿的一方面，农民算整个国家或所在县、乡、村的帐体现农民生育意愿的另一方面。采取微观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农民只算自己的一本帐，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民生育意愿是割裂、甚至是对立的。采取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农民既算自己的帐，也算国家的帐。这两本帐可能是不一致的，如农民在算帐后，可能觉得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对自身利益带来某种损失；但农民在作决策时可能决定牺牲自身利益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因此，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民生育意愿是相联系的，可以是一致的。

采取微观分析法分析农民生育观，从切实解决个人和家庭的与生育相关联的一些利益问题以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出发，能够提出许多非常可取的政策性建议。如把计划生育与养老事业结合起来，采取社会系统工程的办法解决独女户和双女户的实际问题，把控制人口与发展教育结合起来，等等。推行这

些政策可以从微观角度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并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使之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相一致。我们应该切实调整与人们生育有关的利益关系，调整现行政策体系中一些与计划生育政策相矛盾的方面，使之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在这方面，可以做的工作很多，而且应该长期做。采取宏观分析法分析农民生育观，也能够提出有益的政策性建议。如，应向群众反复宣传，使群众牢牢树立人均意识和人口忧患意识。这虽不是新鲜的建议，但采取微观分析法分析人们生育观，从分析的结论本身提不出这一政策性建议来。相反，采用宏观分析法分析人们生育观，从分析结论本身就可以引申出这一政策性建议来。

为什么要加强宣传教育，向群众灌输人均意识、人口忧患意识？这是因为，宏观变量与人口的对应关系所表达的利害是属于人口群体的。人口与宏观变量关系协调，属于这个人口群体的每个人都从中受益；人口与宏观变量的关系不协调，属于这个人口群体的每个人都因此受害。由于无知、狭隘，群众往往意识不到他们的生育行为对宏观变量的作用或给整个人口群体带来的影响。列宁在谈到群众的自发性和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时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同样，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①我认为，列宁的这段话对我们认识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是大有帮助的。套用列宁这段话，我们可以说：群众本来也不可能有人均意识、人口忧患意识，不可能认识到人口数量多、增长快对生态、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就业、国民教育等造成的巨大压力。这种(下转第38页)

^① 列宁《列宁选集》第I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7页。

龄影响的分析”,1990年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杭州研究会论文。

姜恒松“丽水山区计划生育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谈严禁多胎和早婚早育问题”,浙江人口通讯,1986年1: 57~59。

李延龄“早婚问题浅论”,人口战线,1988年,2: 33~36。

李咏华“我国人口早婚、大龄未婚和终身不婚状况”,人口与经济,1986年,4: 43~45。

李荣时“对我国人口初婚年龄的探析”,人口研究,1985年,1: 28~32。

梁中堂、马培生“中国农村妇女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状况的初步分析”,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杭州研究会论文。1990年

刘海燕“人口性别结构的比较分析”,人口研究,1990年,4: 21~26。

鹿立“青岛市家庭状况三十年变迁初探”,山东人口,1985年,2: 41~44。

罗惠泉“四川农村婚姻情况调查”,人口与发展,1988年,1: 9~12。

马建“广东省五年来家庭结构的变化及原因初探”,南方人口,1989年2: 52~54。

孟祥寿、白双秀“农村早婚和非法同居情况的调查分析及建议”,人口学刊,1989年,1: 53~55。

苗剑新“新疆伊犁地区东乡族的婚姻家庭问题”,西北人口,1985年,4: 14~16。

山东省统计局人口统计处“我省1985年未到法定婚龄的已婚人口比例又有所上升”,山东人口,1986年,2: 59~90。

田心源China's Strategic Demographic Initiative, Greenwood Press (Prager), 1991。

吴宏“家庭结构与生育的关系”,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杭州研究会论文,1990年。

吴祥阶“宣恩县高罗公社女性初婚年龄变化的分析”,

(上接第58页)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改变其生育观,进而改变其生育行为。这从一个重要方面说明了计划生育宣传教育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所处的重要位置。

湖北省英山县是老区、山区、穷县,影响生育的各种微观变量与其它地方相比,表现不出抓好计划生育的有利条件。但计划生育工作抓得很出色,198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8.14%,计划生育率达93.30%,多胎率0.6%,一胎率达70.24%。英山县把宣传教育放在首位,对农民进行国情教育,给农民

鄂西人口,1984年,1: 27~29。

放芳“我国三十年来婚姻模式的转变”,人口与经济,1987年,2: 26~32。

谢洛彬“山区妇女的婚姻生育变化初探”,人口研究,1988年,2: 22~24。

邢建文“文成县珊溪区早婚情况”,浙江人口通讯,1986年,3: 59~61。

杨子慧、沙吉才“早恋、早婚、早育回升原因及其对策研究”,人口研究,1990年,5: 1~7。

姚敏“鄂西自治州人口婚姻状况分析”,鄂西人口,1985年,2: 31~34。

姚中本“最佳婚育年龄”,人口信息,1987年,1: 38~39

易友生“中国妇女初婚率状况浅析”,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杭州研究会论文,1990年。

易友生、石玉林“中国妇女初婚模式转变”,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杭州研究会论文,1990年

岳青“从第三次人口普查看我国人口婚姻现状”,人口学刊,1986年,3: 14~17。

余舰“家庭变化的趋向与原因”,鄂西人口,1978年,2: 40~43。

张海燕“巩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从早婚、私婚上升谈”,人口动态,1985年,5: 29~32。

张建伟“对天津市大婚龄人口性别比的探讨”,人口与经济,1986年,40~43。

张俊蓉“试论中国四十二年来初婚年龄变化特点”,人口动态1986年,5: 24~29。

张运福“婚配年龄因素的数学分析”,统计学、经济数学,1986年4: 55~59。

周士刚“奉化山区人口的婚姻迁移”,浙江人口通讯,1986年,1: 41~43。(本文责任编辑 洪映)

(作者工作单位: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社会学系)

算国家、县、乡、村、户五本帐,增强农民的人均意识、人口忧患意识,激起农民对国家、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感,这样做使农民生育意愿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统一起来,这是他们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成效的主要经验之一。

综上所述,研究生育观只有采用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供科学的决策。

(本文责任编辑:郭汉英)

(作者工作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